

史学和社会学视野中的陈翰笙无锡调查

汪效驷¹, 郑杭生²

(1. 安徽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2.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北京 100000)

摘 要: 陈翰笙领导的无锡调查是我国社会学史上一次典范的社会调查, 推动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进程, 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从理论到实证研究的突破。无锡调查体现了陈翰笙重实证和学科融合的治史理念, 为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范本和史料。

关键词: 陈翰笙; 无锡调查; 社会学意义; 史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 C9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2007)02-0101-05

陈翰笙(1897—2004)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持工作期间,领导了对能够说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本质的江南、河北、岭南等地的大规模社会调查,其中以无锡农村调查最为突出。此次调查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和突出的史学价值。本文在追踪无锡调查来龙去脉的基础上,对其史学和社会学价值进行充分挖掘,以此彰显陈翰笙对中国近现代学术作出的突出贡献。

一、陈翰笙其人和无锡调查始末

陈翰笙出生于清朝末年的江苏无锡县,为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于1915年赴美国勤工俭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又赴德国,在柏林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27岁的陈翰笙即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在历史系和法学系讲授《欧美通史》、《史学史》、《美国宪法史》等课程。1929年初,陈翰笙受蔡元培的委托,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的组长并主持该所工作,在此期间领导了著名的三江流域农村调查;在农村调查的基础上于1933年底发起成立了左翼民间学术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担任会长至1951年该会解散。1936年,陈翰笙在美国纽约任太平洋关系学会国际部研究员、《太平洋事务》季刊编辑,40年代后期,先后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并在约翰·哈近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和纽约亚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陈翰笙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活动家。早在执教北京大学时期,他就受到李大钊的影响和感召,并由

其介绍加入处于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27年,李大钊遇害后,陈翰笙被迫前往苏联,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1932年,陈翰笙参与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多方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和爱国人士。30年代后期,陈翰笙辗转去莫斯科任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约研究员,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党创办的《华侨日报》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在香港、桂林等地协助宋庆龄办理工业合作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陈翰笙受周恩来的邀请回国工作,50年代,先后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多次参加外事活动,并任《中国建设》杂志编委会副主任,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60年代初,陈翰笙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室主任,负责世界史学科的重建和发展工作。“文革”后,陈翰笙继续领导和从事各种学术活动直至仙逝。

无锡调查的动因可以追溯到发生在莫斯科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的一场争论。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在共产国际内部引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以马扎亚尔为代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弄清中国的社会性质,因而采取了错误的革命方针和政策,导致了革命的失败。1928年,在莫斯科出版了马扎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对“亚细亚的社会”特征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总结,否认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认为中国农村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1],从而将这场争论推向高潮。当时陈翰笙与马扎亚尔同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工作,在中国农村、中国革命问题上,两人存在着巨大

收稿日期: 2006-11-12

作者简介: 汪效驷(1968—),女,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郑杭生(1936—),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的分歧,“发生过几次激烈争论”。但“由于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扎亚尔”,这促使陈翰笙“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2]40}。这一想法在陈翰笙进入中央研究院工作后得以实现。

无锡调查得以顺利展开,是与“地利人和”分不开的。1928年7月,陈翰笙在无锡开始组织一个45人的调查团,“调查员大多数生长无锡或邻近各县的,其中三分之一为国立北京大学、劳动大学、上海法政专门等学校,研究农业或社会经济的毕业生或肄业生,三分之一为该县高级中学的肄业生;其余三分之一为该县小学教员”^[3]。调查还得到了时在无锡进行民众教育实验人士的热情参与,后来成为调查团骨干并在经济学领域有重要建树的钱俊瑞、张锡昌、秦柳方等人就是民教实验区的基层负责人。调查组成员或接受过专业训练,或有乡村生活的实际经历,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所得材料的可靠性约在90%以上”^{[2]47},也使调查具有参与式观察的“田野”性质。

调查团办事处设在无锡城中,“各组之组长、交际、文书、会计等职务,由组内调查员分别兼任”^{[4]7}。调查员分成4组,分别由张稼夫、钱俊瑞、刘端生、秦柳方担任组长,于1929年7月至9月在无锡县4乡选定了有代表性的22个自然村,计有1204户,进行了三个月的挨户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和生产的基本情况,以及租佃、借贷、典当、捐税负担、商业买卖、生活消费、文化教育等,挨户调查结束后又通信调查了55个自然村的概况和8个市镇的工商业。调查工作报告一段落以后,调查材料带回社会科学研究所,由陈翰笙、王寅生、钱俊瑞、张稼夫、廖凯生等七人整理,还继续补充了许多不能直接取之于农村的税捐、谷价材料及无锡地方史料。数月之后,调查组终于完成了无锡农村调查报告。

陈翰笙进行无锡调查的目的是要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着眼于生产关系的剖析来调查和研究农村问题,得出了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这当然为中央研究院这样的官方研究机构所不容。之后,无锡调查报告“被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扣发了,不让发表,以后也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报告的原稿”^{[5]前言}。所幸调查原材料得以完整保存下来,解放后,辗转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至今。

正是基于对无锡调查重要性的认识,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联合其他相关单位又进行了四次后续调查,1958年春,由孙冶方、薛暮桥主持,从第一次调查的33个自然村中选择了22个村,对其4000多农户进行了全面调查。这次调查一方面对1929年的调查作了全面系统的补充,并对1936年、1948年、1952年作了追溯调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历史资料和数据;另一方面,又对上述村庄和农户的1957年状况作了详细调查,形成了1957年度的详细资料和数据。第三次调查在改革开放以后的1987年进行的。在著名经济学家杜润生、董辅初领导下,由经济所与国务院农发所合作,仍然以第二次调查的22个村为对象,进行了村概况调查,并以抽样的方式,对5000余户农户进行了家庭调查。上述三

次对无锡农村的抽样调查,尽管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积累了丰富珍贵的资料,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没有形成最终成果,资料也始终没有正式出版,现仍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第四次调查开始于199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荷兰莱顿大学合作进行。除了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农户调查、村概况调查以及多项专题调查外,还对前三次的调查资料进行了整理研究,并挑选了240户农家又进行了70年的历史追踪调查,并在上述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建立了数据库。

因此从广义上说,无锡调查是指由陈翰笙开创的,被中国社会科学界几代学者所继承,在解放前后的无锡农村进行的系列调查。可以预料的是,这一调查还会继续下去,在当今社会科学界的影响也会持续发酵。

二、无锡调查的社会学意义

无锡调查本质上是一次社会学调查,是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的名义进行的。它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一次典范的社会调查,成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大事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无锡调查堪称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典范调查。第一,调查有明确的理论先导。陈翰笙入主社会科学研究所后,对社会学的发展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今日,科学的社会学已陷于危险的境地。它不是偏倾于社会现象之一种无意义的分类,便只自封于种种哲学观念的一个抽象体系。这两种情形都不能使我们了解具体的社会实质。”因此指出:“社会学的主要工作,在使现时的社会实质进抵于科学的认识,而解释其进展的路向,不忘其一切历史的和经济的意义,分析人类的相互关系,而明了某种社会条件之下的集团意识。简括的说,社会学是要研究社会结构之正体、反体和合体,社会意志之动作,反动和创立,以及现时的社会意志,如何受动的社会结构的决定,和此社会结构在其演进上如何接受社会意志的影响而产生新的社会意志。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之现时的实质的科学。”进而提出“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因此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就拿中国的农村研究作为它的第一步工作”^[6]。陈翰笙还认识到:“中国社会调查与统计尚在极幼稚时代。研究社会学者苦无可靠可用之材料……目前急需从事中国社会经济之调查与统计。”在对社会调查的现状作了批判性总结之后,决定与社会学组同人“抛弃以前政府统计之残屑,不顾一切违反中国实情之报告,而从事有意识有组织之农村经济调查”^{[7]7}。

第二,此次调查并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学科整体发展规划的组成部分。陈翰笙作为社会学官方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对社会学的发展进行了全盘规划。无锡是社会学组系列农村调查的第一站,此后的1930年5月至8月,社会学组组织了河北保定农村调查,以市场、村庄和农户为三级对象,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1933年11月到1934年5月,陈翰

笙、王寅生、薛暮桥等人又南下广东,在宋庆龄和时任中山县县长的唐绍仪等人的协助下,展开了岭南农村的调查。还开展了对东北难民和安徽、山东、河南烟草区的调查。社会科学所在陈翰笙主持工作期间,除了农村调查的有序开展以外,“对于其他可用的现成材料,如个人谈话及观察,个人通信,官署案卷,地方志,各种机关报告,个人著作及当代书报等,亦未尝忽视”。研究所就某些课题出版了专刊,如《中国黑龙江流域农民与地主》、《难民的东北流亡》,还编制出版了《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台湾的租佃制度》和《近代农村经济的趋向》等参考资料,“以提倡农村经济研究的兴趣,并以助研究者容易了解资本主义的、前资本主义的及现代殖民地的社会结构”^[6]。这些专刊和资料有很大一部分是由陈翰笙亲自完成的。

第三,无锡具备作为调查地点的典型性。调查的参加者之一廖凯生将调查无锡的理由归结为“无锡是纯粹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一个地方”;“无锡耕地的零碎和田权的复杂也是一种特征”;“借贷、押当、起会、放贷等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在无锡农村中具有雄厚的实力”^[3]。陈翰笙也在自传体回忆录中说:“江南、河北和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假使我们能彻底地了解这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如何演进,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变化的程序,就不难窥其梗概,而对挽救中国农村的危机,也就易于找出有效的办法了。”^{[2][155]}

第四,无锡调查安排得益,方法科学,推动了社会调查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基于地权严重分化的现实,调查组根据自耕农、雇农、佃农、工人、商人的多少,在无锡农村选出普通村9个,特殊村13个,共22个村,展开调查。这种分村调查系概况调查,可以了解一般的趋势;至于统计材料的获得,则依赖挨户的周详调查,二者相得益彰。实地调查结束后,还在当地四乡约定了18个通讯调查员,以获取需要补充的材料。这样深入到社会底层的大规模社会调查在当时社会科学界是绝无仅有的。在进行农村调查的同时,以陈翰笙为首的“中国农村派”的一些成员还进行了农村调查理论和方法的探讨。1934年,张锡昌著《农村社会调查》一书由黎明书局出版。张锡昌的《怎样做农村调查》一文发表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中国农村》第2卷第3期上,《中国农村》第2卷第6期还登载了韦健雄的《农村经济的调查和统计》一文。

无锡调查推动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是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30年代初期兴起于中国社会学界的,那时的中国社会学学者几乎都程度不同地投入了这一运动”^{[8][344]}。不难看出,陈翰笙领导的无锡调查正是发生于这一时期。对本土社会调查的拓展和深化是社会学中国化的具体体现;与同时代其他社会调查不同的是,如前所述,无锡调查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具有更加鲜明的本土特色。

调查得出了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有力地配合和指导了中国革命的实践。在无锡调查材料前期

整理过程中,田亩标准的混乱和田权的复杂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陈翰笙、王寅生等即撰写专文《亩的差异》^[9],对无锡22个村稻田的173种大小不同的亩进行了归类和较准。另对田权也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指出“土地面积标准的缺乏,农田的分散和农村地权的非常复杂,都很明显地指出一种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6]。陈翰笙进而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社会,纯粹的封建已过去、纯粹的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正在转变时期的社会——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叫前资本主义社会。”^{[10][49]}也即中共此前提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至此,无锡调查从实证的角度解决了中国社会性质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为中共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进行土地革命提供了恰当的注脚。

无锡调查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先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的里程碑。如同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当中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分野一样,在社会学领域也存在着秉承西方社会学传统的所谓主流派和以唯物史观为根本法则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尽管后者常被以正统自居的社会学家归于“主义学说的范畴”,“非是科学的探讨”^{[11][151]},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存在和发展则是一个客观事实;如果说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李达、许德珩等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建树者,那么陈翰笙领导的无锡调查则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先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无锡调查是一次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的社会调查。陈翰笙早在执教北京大学时期就在李大钊的引导之下,皈依了马克思主义,主持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以后,购置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这给入所工作的年轻人以很大的影响。薛暮桥回忆道:“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书籍很多,我开始读了《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帝国主义论》,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进一步提高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12]陈翰笙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发起了无锡调查,调查开始之前,还组织组员系统学习了《资本论》,确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贯彻于调查的始终。而确立什么样的调查重点则是区别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的关键。鉴于当时“中国的农村调查不是为了慈善救济起见,便是为了改良农业,要不然也不过是供给些社会改良的讨论题目。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的现实,陈翰笙认为,农村诸问题的中心“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他的农业生产的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6]。因此调查的重点就是考察农村的生产关系,他们采取列宁的农户分类方法,按照阶级剥削(包括交租、出卖劳动力和高利贷等)把农民分为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对调查材料的整理则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也与中共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一致。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调查中国社会并非始自陈翰笙。出于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早期共产党人就注重对其控制的农村区域进行实地调查。早在1927年初,毛泽东就对湖南省的农民运动作了调查,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此后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又在江西、福建、陕西等地农村展开了多次社会调查。这系列调查为中共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应该指出的是,解放区的农村调查是针对和防范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而进行的,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和可操作性。它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无形中暗合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发展路径;但缺乏学术自觉,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出现的理论问题,按照学术规范展开社会调查,弥补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证研究的缺陷,是从陈翰笙领导的无锡调查开始的。

三、无锡调查的史学价值

陈翰笙的无锡调查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国共两党激烈的政治较量必然使知识界产生因政治立场迥异而导致的学术分野。陈翰笙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学术活动植根于中共革命的实践,体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革命理想。但是陈翰笙与同时代的范文澜、郭沫若等人借史喻今的治史途径截然不同,他将学术关怀集中于现实,将治学方向适当延伸,最终在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一点发人深省。无锡调查是陈翰笙治史理念的集中体现,在史学方法论上至少能给后人提供两点重要启示。

一是重实证。陈翰笙首先是一位史学家,接受的是历史学的正规教育,对史学理论与方法有深刻的认识,重视史料是他的一贯作风。他早年在芝加哥大学写就的《1911年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伦敦使节会议》一文,“引述都有出处,无一语无来历,所作评论性断语,均持之有故,所以推论既自然、严谨而又可信”^{〔13〕⁵⁶},展现了深厚的史学功力。与陈翰笙共事多年的著名农学家吴觉农在陈翰笙百岁华诞庆祝会上这样说道:“他从不作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每研究一个问题,必定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广泛收集资料,认真进行分析。”吴老还列举了实例:“翰老早在1924年就写过一篇关于鸦片战争前后中英茶叶贸易的文章,全文仅三千多字,引证的书刊多达50多种(仅参考的就有50多种,阅读过的最少应在百种以上),因此文章立论有根据,内容充实,真是掷地有声。”^{〔14〕²⁴²}周谷城在为《四个时代的我》所写的序言中坦陈为陈翰笙“重视资料的精神”所“惊讶”,还提到陈翰笙写在自己照片背后的几句话“如果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料,或未经缜密的分析,决不可以轻易下结论”^{〔2〕¹}。在受命重建世界史学科的过程中,陈翰笙多次强调史料问题,主张“研究工作应当从大量可信的史料中去精心探索,我们必须在充分地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还指出,第一手资料是指“第一是地下挖掘出的大量文物资料。第二是中外各国的已出版和尚未出版的各种档案。第三是当事人的可靠的记载,尤

其是回忆录、书信和日记等”^{〔15〕}。晚年,陈翰笙主编出版了十卷本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为华工和华侨史研究提供了基本史料。用事实说话是陈翰笙治学的本能,当年在莫斯科与马扎亚尔的争论未果,促使他“要拿出充足的证据……从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入手”^{〔2〕¹⁴⁵}。所以,无锡调查正是陈翰笙学术倾向的直接体现,是实证史学的自然延伸。

二是学科融合。无锡调查是陈翰笙以史学家的视野、社会学的名义进行的。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他曾对社会科学各学科,特别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关系进行过阐述:“社会科学中有两种重要科学,非专究社会生活之某一方面如经济、法制、宗教等等,而以至周密之方法整个观察社会生活之全部者。此即史学与社会学也……社会学探讨人类进化之原则,以为研究史学之方法,故可称为社会科学中最概括、最抽象之科学;史学则整理可靠之史实,以供研究社会学之材料。史学固当以社会学之哲理为指南而后可得正确之方法,社会学亦须筑于历史的事实上而后可免错误之论断。”^{〔16〕³}无锡调查是陈翰笙运用多学科交叉的办法,进行学术研究的成功尝试。回顾陈翰笙的学术道路,此前他的研究和教学基本局限于史学和政治学领域,除了在求学时期写就的史学论文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曾参与编辑《现代评论》,1925—1927年在此刊上共发表53篇史论兼政论性的文章。无锡调查则是其从理论到实证研究的分水岭,也开创了中国农村研究的新时代。在实证研究的同时,陈翰笙也重视理论概括,社会学组于1930年出版的《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是一部对欧洲封建社会土地制度比较研究的总结,是他本人在作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工作时给自己看的非常别致的著作……其目的在于使他在进行实地调查时有明确的理论指导,以免失去方向”^{〔17〕}。也是陈翰笙将自己的史学专长应用于农村调查,以使研究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查目的得到贯彻和彰显。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的一系列著作,如《中国当前的土地问题》、《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解放前西双版纳土地制度》等,除了论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这一主题外,无不体现了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现实的完美结合。当然,并非所有的史学工作者都能跨越学科壁垒,轻松驾驭其他学科;今天的学术分类和规范也并非提倡学科僭越,但是,学科融合,特别是相邻学科的融汇贯通应该是学术发展的基本取向,陈翰笙的学术实践无疑值得我们借鉴。

除了史学方法上的启示之外,无锡调查对中国近现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意义重大。一方面,无锡调查为研究转型中的中国近代乡村社会提供了范本。无锡能够进入调查视野,主要在于它是“长江三角洲有代表性的纯粹工商业资本最发达的地区,不像当时的沪、津、穗,仅有外国的资本入侵”^{〔18〕¹⁸⁶}。这也决定了无锡作为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研究样本所应具有的典型性。陈翰笙试图用实地调查来证明无锡这样近代化的先锋地区尚存“封建的生产关系”,进而推断中国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这在逻辑上是严密的;而这一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引起的乡村社会的变化是调查的

应有之义,只是被调查本身浓厚的政治色彩所遮蔽。如果廓清政治迷雾,无锡调查展现的恰是转型中的乡村社会的实态。今天用史学的眼光来审视,其调查所得就不仅仅是经济数据,更应该是社会史的材料。生产关系是调查的重点,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调查还涉及乡村阶级或阶层的变动、居民的消费构成、人口的流动及乡村教育状况,无一不是乡村社会史的研究内容。无锡作为中国近现代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还引起其他调查者的注意,留下了大量的相关史料,它们与陈翰笙无锡调查及后续调查材料相互补充和印证,为近代无锡区域乡村社会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另一方面,无锡调查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当时共对22个村1207户村民进行了逐户调查,每一户发放一册20多页的调查表,由专人负责调查填写。这种以农户为单位,近似家庭档案的材料在同时期传世的史料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些调查表可分可合,既能再现农户生产生活的某些片段,又能在归类 and 统计的基础上呈现这一地区的农副业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的特征以及物质文化生活状况。在前两次调查基础上形成的《江苏无锡县近卅年来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29—1957年)^[19]就动态地展现了卅年来经济关系的变化、农业生产水平的变化和副业兴衰、人口增长和劳动力的变化等方面的内容。无锡调查的参加者如廖凯生、秦柳方、王寅生等人后来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名义,继续进行农村调查和研究,写下了许多调查报告、专著和论文,发表在《中国农村》、《劳动季刊》、《农业周报》等报刊上;20世纪80年代,由著名农业问题专家冯和法负责搜集、编排,合为三辑计300余万字的巨著——《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由展望出版社陆续出版,其中包括《原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县(市)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29—1948)》。这是以陈翰笙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农村问题研究成果汇编,是

一部里程碑式的重要文献,也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这部著作以及“中国农村派”的其他农村问题研究成果已成为今天研究中国近代乡村史引用频率很高的史料。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联合相关部门在无锡农村进行的三次后续调查与陈翰笙的调查口径和对象基本一致,时间跨越解放前后的不同时代,形成一套研究中国70年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演变的独特资料。

令人遗憾的是,无锡调查的史学价值并未充分显现。与同期稍后的保定调查相比,无锡调查显然受到学术界不应有的忽视。前者既有调查报告留存,又有研究成果面世^[20]。后者不仅遗失了调查报告,而且其原始材料至今仍作为“镇馆之宝”收藏在中国科学院经济所图书馆,仅后来补充的调查报告和数据被个别学者初步引用,对无锡调查材料的整理和专项研究亟待展开。

由是观之,无锡调查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实践活动,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意义重大。陈翰笙在史学方法上留给我们的启示直到今天仍是治史的基本原则。无锡调查为中国近现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样本和史料。农村调查只是陈翰笙学术成就的一个方面,他对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还有待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和研究。

主要有顾倬《第四区 江苏无锡县农村经济调查 第一集》江苏省农民银行总行,1931。满铁调查部《江苏省无锡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满铁研究资料第38编),上海版,1941。苏南区农民协会委员会《苏南农村经济资料》1951。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 华东农村经济资料 第一分册》,1952。

初步应用研究仅见崔晓黎的《家庭·市场·社区——无锡清苑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的比较研究(1929-1949)》(《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一文和吴柏均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一书。

参考文献:

- [1]马扎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M].神州国光社,1930. [2]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3]廖凯生.社会科学研究所无锡农村调查记略[J].中央研究院月报,1930. [4]陈翰笙.陈翰笙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陈翰笙等.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村经济[M].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8(2)增刊. [6]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J].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劳动季刊,1931(1). [7]陈翰笙.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M]//陈翰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9]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1号[G].1929年单行本. [10]陈翰笙.中国田地问题[M]//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11]赵承信.中国社会学的两大派[M]//郑杭生等.中国社会学史新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12]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13]陈乐民.关于翰老早年的一篇论文[M]//陈翰笙百岁华诞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4]吴觉农.求真求实,刚正不阿——祝贺我所敬重的翰笙同志[M]//陈翰笙百岁华诞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5]陈翰笙.对研究世界史的几点意见[J].世界历史,1978(1). [16]陈翰笙.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M]//陈翰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7]陈洪进.陈翰笙的史学思想[J].世界历史,1985(10). [18]秦柳方.柳风拂晓[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19]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8(2)增刊. [20]张培刚.清苑的农家经济[J].社会科学杂志,1936(1)(2)(3);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许周鹤)